



王养冲先生

■ 陈红民

王养冲教授,1907年生,上海市南汇县人。曾任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胡汉民秘书数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三、四十年代,旅居法国十年,研究欧洲哲学史和法国大革命史,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47年归国,先后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教授是国内法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学术成就斐然,数十年间论著、译著多种,如《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法国大革命史》、《拿破仑书信集》等。1993年退休,现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9年2月1日下午,笔者就在阅读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函电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前往华东师范大学,求教于王养冲教授。王教授记忆力惊人,思维敏捷,六十多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近三个小时的谈话毫无倦意。兼具历史见证人与史学家双重身份的王教授鼓励学术研究,提携后进的精神和对既往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笔者如沐春风,获益匪浅。

更值得一书的是,笔者将访问记录整理后呈请王教授审核,已九十三岁高龄的王教授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改动处不仅事关史实,且旁及遣词造句的准确性。王教授担心笔者难以辨认他的字迹(其实相当清晰),又让其公子王令愉教授重抄一遍,附在旁边。笔者充分领略了王教授治学与为人严谨认真的风范,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访问所涉及的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国民党史与中华民国史的问题,现蒙王教授慷慨惠允,将其亲自修改

后的访问记录发表,供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参考。

以下“王”为王养冲教授,“陈”为访问者陈红民。

一、关于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

陈:王教授,我在美国作访问研究时,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读到一大批胡汉民在三十年代初期与各方的函电往来原件,约有二千五百多件,不知您原先是否知道这批资料存世?

王:有这批资料,当时还是我储藏保存的,但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件。

陈:这批资料是六十年代由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捐给哈佛大学的。其中相当多是胡汉民给别人函电的留底,不是他的字迹,我想您是他的秘书,该是您的手迹吧?

王:不是。胡先生多数寄送出去的信件是由我起草,交书记抄写、寄发,并留底。

陈:我在一篇介绍文章中判断留底是您的字迹,看来弄错了。对不起。现在我们就开始访问,如果有您觉得设问不当的,可以跳过去不答。

王:没什么,我都可以回答。

陈:谢谢。1931年“汤山事件”后,胡汉民与蒋介石彻底分裂。“函电稿”中有许多涉及胡汉民组织反蒋活动的内容。据您所见,他们的政争除了在政见方面的分歧外,是否也有权力分配的因素?

王:政治主张方面的不同显而易见,我们当时的主张是“抗日、反对军权统治、剿共”,反对军权统治就是

针对蒋介石的。权力分配的因素是有的。蒋介石把党权交给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几乎所有老国民党员都有异议,蒋却一意孤行,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强化他个人集权,这是国民党分裂的原因。

其实,胡先生对蒋的不满在南京时已较深,难以长期合作下去,对政治失望。即使没有“汤山事件”,胡先生也会寻机退出的。他曾几次说起要回广东休息。

陈:胡汉民在南京时有一句口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南下后他却自成一派,这是否前后矛盾?

王:对这句话的理解有误。胡先生要求的只是国民党员的操守,不能在参加国民党之外再加入别的政党,反对跨党分子,这不是针对其他党的,更不是限制其他党的成立与发展。胡对国民党的感情很深,他曾说过“总理(孙中山)在,我以总理为党;总理不在,我以党为总理”,这句话也有人不理解。

陈:1934年后,南京与粤方在“五中全会”的召开问题上争执了很久,原因是什么?最后粤方为何让步?

王:作为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在党章上有规定,如果没非常的理由,不能不让开。粤方并非不让开,而是强调会议的议题应该包括抗日与党内民主,这在“齐”、“有”两次通电中有明确的反映。

陈:胡汉民在“五中全会”前出国养病,是否有政治目的,如与蒋介石达成某种谅解?

王:没有政治目的,那时他真是病了,需要出国治疗养病。当时确实有生“政治病”的人,所以对胡先生的举动有不少猜测也是正常的。

陈:邹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胡出国还是一种政治安排。

王:不是这样的。

陈:胡汉民在国外受到中国大使馆规格很高的接待,还给他看国内发来的绝密电报,是否意味着南京方面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王:高规格接待没有特别的意义。胡先生始终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接待他是正常的事。

陈:1935年底胡汉民于“五中全会”一结束就从欧洲回国,滞留在广州,他有无去南京的打算?或者说,在去不去南京的问题上,胡汉民是否有过变化?

王:有过一点变化。胡先生回国时,我去新加坡迎他,他一见面最关心的是南京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他

和南京的使者居正等谈了几天,主要也是围绕抗日,要求不是空口说,要看行动。他在回国的路上尚未决定是否要去南京,经过香港后越来越发现情况不是他想要的,就决定不北上了。但他住在广州,没再回香港。住在国内,也是一种变化,一种积极的表示。

陈:胡汉民在最初的谈话中称,一俟春暖,即行北上。这是否要留有后路?

王:不是留后路。那个谈话是我起草的,当时的情形,胡先生就是决定暂不北上。

陈:1932年后,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有无特别的联络的管道?

王:没有特别的管道。蒋介石曾几次派人见胡先生,李晓生也曾代表粤方同南京方面有过接触。几次都是因事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管道。

二、关于“新国民党”

陈:“新国民党”是否存在,一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函电稿”中有大量信件证明胡汉民三十年代确实领导过一个组织。

王:当时有不少国民党员赞同胡先生的主张,在邹鲁的主持下,这些人都进行登记,但从来没有用过“新国民党”的名称,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胡先生就用“中国国民党”,指责南京蒋介石已背弃了孙中山的主义与国民党的历史。

陈:确实如此。但依您的看法应该如何称呼这个组织呢?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毕竟一提到“中国国民党”,多数人想到的是南京与蒋介石。今天该如何区别这两个名词相同而政见相左的“中国国民党”呢?

王:还真难说。在我心里,区别是很明显的。

陈:我心里也很明显。可既然已有不少人用“新国民党”这个名词,我们不妨也借用,以便于一般研究者区别。不知您以为如何?

王:也可以吧。

陈:“新国民党”准确的成立日期?有无成立仪式(如大会等)?有无结束手续?经费从何处来?

王:大概在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等几位先生商议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但没有开过成立大会也没有别的仪式,所以也就很难说它准确的成立日期。因为完全是以胡先生为核心的,他1936年去世后,大家就散伙了,也没有结束手

续。

经费主要是西南政务委员会提供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的钱又来自广东省政府。其实，要维持也用不了多少钱，各地方组织都是自愿的，给他们的经费不多。

陈：“新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结构如何？是否以“西南执行部”为中央机构？除萧佛成、邓泽如、邹鲁、刘庐隐之外，还有什么人？

王：中央上层只有萧佛成、邓泽如和邹鲁三人。萧先生、邓先生在党内的资历很老，是与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的，对党有感情，与胡先生看法一致。邹鲁则非常能干，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刘庐隐得到胡先生信任，他有时在广州，有时去上海。

中央机构是独立的，与西南执行部不是一回事。西南执行部是以在西南的中央委员组成的，但这些人里面不少人没有加入新组织。

陈：“新国民党”有哪些地方组织，其具体名称是什么？上海的组织有的地方称“上海干部”，有的称“长江交通部”，到底哪个正确？

王：地方上没有正式名称，也没有登记。有组织的很多地方，广州是大本营，上海、天津的组织较重要，它们同时负有领导更下层组织的责任。天津负责北方，上海负责长江中下游各省。比较起来，北方的组织由邹鲁直接领导，成绩要大一点。

陈：请介绍“新国民党”在上海的基本情况。

王：上海主要是刘庐隐与李晓生负责联络的。原先胡汉民先生在上海的联络人是民智书局的老板林焕庭。民智书局是当年海外华侨为印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建立的，孙先生写完《三民主义》后，曾交商务印书馆会印，未被接受。1933年林焕庭去世，胡先生就派李晓生来往于沪穗之间，接替联络工作。李晓生曾在法国生活过很久，1928年起任立法院秘书，1931年“汤山事件”时，是唯一获准出入胡宅，照顾胡先生生活的人。胡先生对他比较信任。

在上海做事较多的是何世楨与陈群。另外还有一批人，领点津贴、交际费，有时做些事，如陈嘉佑、陈中孚、桂崇基、熊克武等。他们在法租界有一个电台，保持与广州的联络。民智书局是主要的活动据点，另外，陈群还拿出自己的一处房子供大家聚会，在哪条街不记得了，门牌是17号。我1935年到上海时曾去过。

陈：在“函电稿”中有方振武率所部集体加入“新国

民党”的记载，此事确实吗？另外，方与胡汉民的关系似非常密切，有无特殊原因？

王：有这件事。方振武在举国不抵抗的时候，能孤军抗敌，胡先生很赞赏，特别重视这支抗日力量，在经济上尽力帮助。方对胡先生也很尊重。方振武军事失败后，到了香港，住在跑马地，我还受胡先生命去看过他，他也来拜访过胡先生。后来方出国，胡先生又尽其可能对随方来港的部下进行了安排。记得有人送到了广西，有人去了《三民主义月刊》编辑部。

陈：冯玉祥是否加入过“新国民党”？

王：应该算参加过。冯先生是唯一在张家口率部抗日的，他的活动在精神与形式上，都与胡先生站在一起。冯在张家口时，与胡先生联系较多，兵败后其部下也有到香港的。

陈：从“函电稿”看，海外华侨，尤其是美洲华侨与胡汉民往来十分密切，有的也参加了“新国民党”，请说明两广与南京在海外的斗争。

王：这种情况不仅美洲有，欧洲也有。1937年我到欧洲时还遇到拥护胡先生的华侨，给我看他们当时印发的文件。国外的华侨在政治倾向上是分裂的，有人拥护胡先生，有人听命于南京。其实最早南京方面与华侨的联系远不及广东，但后来蒋介石特别注重培养在国外的力量。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在美洲是三藩市（旧金山），在欧洲是巴黎。

三、关于胡汉民与西南的关系

陈：“函电稿”中有大量胡汉民、萧佛成等对陈济棠搪塞敷衍不满的信件，双方矛盾的症结在出兵反蒋，资助各地反蒋抗日力量方面。胡与陈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否是在互相利用？

王：萧先生等人知道广东军队的实力不如南京，他们只是要陈济棠能利用时机摆出“武谏”的姿态，而陈考虑的主要是广东的地盘，他面临着蒋的压力，不能公开决裂。另外，他还有“剿共”问题。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把红军往南压，实际上是驱共南下，还有许多老百姓逃难到广东，广东的压力非常大。陈济棠派余汉谋的部队驻守赣州，就是想屏障广东，不让红军进来。后来白崇禧告诉我，两广在红军长征时放出一条道，让红军过去，留下来不行，打又两败俱伤，只能放他们快点出境。

陈济棠知道,有胡先生在南方,蒋介石就不会动武。当时有人说,胡先生在世,相当于十万精兵,主要是他的影响大。所以胡先生在世,宁粤间还太平。1935年胡先生一过世,陈济棠感到危机就在眼前,而蒋介石也不再有所顾忌。胡先生5月中旬过世,两广6月1日起兵,以攻为守,但不几日就被蒋解决了。

陈: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与广东省政府的关系如何?前者的经费是否由后者资助?

王:没有直接关系。西南政务委员会并不能直接指挥广东省政府,但经费确实是由广东省政府提供的。

陈:胡汉民在香港及出国的费用从何处来?胡家在港的房子由何处来?

王:他在香港和出国的费用都是由广东来的。胡家原来没有房子,在广州和香港都是租房住,我们刚到香港时住在妙高台,就是租的。后来干德道的房子据说是美洲华侨捐钱盖的,华侨觉得胡先生为国一生,竟然居无定所,于心不忍,出钱帮胡家盖了房子。

陈:从“函电稿”看,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与胡汉民十分接近,胡与他们的感情也较与陈济棠为亲近,实际情形是如此吗?

王:广西非常想有所作为,李、白要建设“新广西”,抱负不小。可广西比较穷,历史上财政一直要靠广东补贴,三十年代时仍如此,行动上就不能不注意广东的态度。

陈:西南有了政务委员会和执行部后,一直想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到底成立没有?如成立,则人事与结构如何?

王:没有正式成立。

陈:福建与广东的关系如何?陈济棠似乎一面拉拢福建,一面又总是防着陈铭枢、蒋光鼐与蔡廷锴等人。

王:是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蒋光鼐等人的处境与广东相似,两省又相邻,所以一度联络很多。但陈济棠当初是靠古应芬等的支持将陈铭枢挤出广东才有后来局面的,他怕十九路军重新染指广东,所以特别要防。

陈:“福建事变”发生后,胡汉民的态度是否受到陈济棠的牵制?他是否曾有借机反蒋的计划,如在广西开府?

王:事变发生后胡先生自己写的电报,表示对事变不闻不问的态度,其中有一句是“以燕伐燕,吾为何功,

不直不见,舍我何伤”。他对福建方面的意见主要是不满陈铭枢废国号建人民政府、联共等政策。开府广西不可能,广西太穷,经济上靠广东资助,怎么能独立开府?

陈:事变失败后,李济深、蔡廷锴仍与胡有书信联系。这说明什么?

王: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很深的矛盾。邹鲁与蒋光鼐、蔡廷锴关系密切,李济深在梧州中学读书时,胡先生是他的老师。事变失败后不但有书信联系,李、蔡都到香港来拜访过胡先生,承认自己做事太莽撞,连党都不要了。

陈:胡汉民组织西南联合,具体实施过程中,在桂、黔、滇、川、湘、闽各省之间有无亲疏或轻重缓急之分别?

王:广西与广东联系在一起,人称“两广”,当然关系最亲近。贵州王家烈也常与胡先生联系,他的一个财政厅长叫郑先莘,给我们写过不少信。王家烈的夫人更是常驻两广,因为两广是贵州物资的进出口,不能不搞好关系。湖南何键到过广东。云南龙云关系远一点。四川连续内战,根本就不统一。所以如果粗略地把各省排个队,由亲而疏大致是:桂、黔、湘、滇、川。原先福建走得也比较近,可闽变后大家分道扬镳,福建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四、胡汉民与其他人的关系

陈:1931年底逼蒋下野与孙科内阁的建立,是胡汉民与粤方的一大胜利,缘何孙科内阁竟迅速垮台?是否与粤方的不支持(如广东截留关余)有关?

王:孙科内阁主要是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压垮的。孙科并不完全听从广东,他与陈济棠关系不好,广东方面有自己的困难,无法全力支持他。胡汉民最初很想劝汪精卫回广东,开创局面,但被汪所拒。蒋汪联合意味着蒋介石政权的强固,汪精卫所得较少,最后当了汉奸。

陈:从历史上看,胡汉民与孙科的关系怎么样?孙本是从广东起家,与蒋亦不睦,缘何在任内阁倒台后不再回粤而留沪?

王:孙科这个人有少爷脾气,在广东当市长多年,独断专行,和陈济棠弄得很僵。自从去南京当铁道部长后,局面大了,更要创大业。胡汉民、汪精卫走后,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更不会再回广州。此后,胡汉民与孙科

个人的关系并没断,孙到香港见胡先生,态度很诚恳。但他有自己的打算,舍不得南京,南京的天地与舞台比广州大多了。

陈:伍朝枢的情况是否与孙科类似?“函电稿”有他不肯回广东任省长的记载。

王:伍朝枢当初为抗议“汤山事件”,愤而辞去了驻美国大使,立场坚定。他不愿当广东省长,却要当琼州特区行政长官,要求有特权,将琼州变成独立区域。广东无法答应这一要求,他宁肯不做。

陈:胡汉民曾一度视张学良为蒋的爱将,在榆关失守后,猛烈抨击他。但1934年张下野出国后,胡又拉拢张,其间有无特殊原因?

王:不是拉拢。胡先生一直认为张学良本质不错,不是甘心抛弃东北,完全是按蒋介石命令做的,大家应该谅解他。但在榆关与华北放弃守土之责必须抨击。张学良自己也觉悟了,他从欧洲回国经香港时,我和胡木兰去码头接他,他手上拿着“认罪书”下船。所以也要理解他,实际上他是完全给蒋搞垮的。

陈:陈融与胡之间的信件来往频繁,保持着“热线”联系?他是否是胡与陈济棠的中间人?

王:陈融与胡汉民是至亲,胡夫人陈淑子是陈融的妹妹。陈融文人气重,不要做官,谭延闿当行政院长时,硬要他去南京做行政院政务处长。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陈济棠又要他做秘书长。胡与陈都能接受他,相信他。可以说他是胡汉民与陈济棠联系的中间人。

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胡汉民与杜月笙的关系。

王: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目,本与胡先生没什么关系。由于陈群牵线,胡先生1931年底从南京抵上海时,他去迎接,胡先生南下时,又去码头送行,无非是显示他神通广大,与各方都有交往,同时也显示上海是他活动的地盘。胡先生南下后,双方只有些礼节性交往。

陈:胡汉民与孙殿英的通信不少,他们的关系如何?

王:孙能率部抗日,又受到蒋介石的逼迫,胡先生赞赏他的行动,同情他的处境,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两人历史上没有多少个人关系,但1928年孙殿英就开始给胡写信,我在立法院见到过。

陈:陈中孚曾代表胡汉民到海外考察,有考察报告,他们的关系如何?

王:陈中孚是个日本通,神通广大,孙中山当年都

向他借过钱。他时常出国,与胡先生也有来往,但他出国不一定是受胡委派,也不是代表。

陈:胡汉民有几个秘书?有文字说程天固是胡汉民的英文秘书,确实吗?

王:从立法院时期起,胡汉民的秘书只有我一人。李晓生是立法院的秘书,秘书长是李文范,我是立法院院长的秘书。到香港后,我一直与胡先生住在一起,他的文字都由我处理。

程天固是李晓生的妹婿,最初得到古应芬的提携,曾当过广州市长,但陈济棠极不满意他,要枪毙他。程逃到香港,因李晓生的关系,就住进了干德道胡汉民兄长胡清瑞原来的房子,与我们正对面。胡先生1935年出国养病时,程主动提出自费随同。因而有报道据此说他是胡先生的英文秘书,其实并无此事。这次旅行对程很重要,他得以跟上了王宠惠,后王主持外交,程被派往巴西等国任大使。

我没有看到程天固为胡先生翻译过什么,胡先生曾发表英文的声明,也不是他起草的。有次陈友仁来访,为胡先生做翻译的是李晓生。

陈:看“函电稿”的过程中,有一个较强烈的感觉,胡汉民晚年所联合的力量,在军人方面,是西北军旧部或地方军阀;在党政方面,则是一些失意于蒋介石的人士。这些人与胡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十分一致。这种做法与胡从前所强调的“以主义结合同志”有相当的差距,是他的政治理念有变化,还是迁就环境?

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些人在政治上要找个头头,胡先生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自己不会去特意联络人,但人家找上门来,明知不是同路人,也不好拒人千里之外吧。

陈:最后,请谈谈您弃政留学的简单经过。

王:胡先生去世后,西南势力随即解体。我对政治已十分厌倦,当时我还年轻,才二十九岁,自己可以重新规划生活。多方比较后,决定赴欧洲旅游,随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东归。从1937到1947年,在法国共学习、生活了十年。

陈:十分感谢您能接受访问。我弄清了不少问题,以后恐怕还会登门请教。

王:不客气。我知道你做研究也不容易。